

进行所谓组织和指导行政，即建立地方伪政权，其做法是赶走原县官，派遣指导部员充各市、县、旗的参事官，参与市、县、旗的行政，组成由日本人操纵的市、县、旗的自治执行委员会（公署）。据于静远、曲秉善、王子衡等供认，由他们派遣指导部员去组成的市、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即公署），有榆树、昌图、海城、黑山、开原、铁岭、辽阳、盖平、营口、安东、抚顺、瓦房店、北镇、盘山、大虎山、台安等三十多个县。据于静远供认仅由他就向“十六个县派遣了二十多名日本人自治指导员”参事官，伪满洲国成之后，就把这些日本人参事官改任为副县长。而伪自治指导部的这一作法，正是开了伪满使用日本人为伪政府官员的先例，实为它的起源。

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于1932年3月“改为‘资政局’，隶属于伪国务院，不久就取消了。”它的多数成员成了伪满洲国政府和伪协和会的中坚分子了。在伪自治指导部解散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特为其举行了招待宴会，并致词说：“诸位为地方自治是有功很劳苦的，今后尚希望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特备粗宴，略表慰劳之意，并祝诸位健康。”这表明关东军对伪自治指导部的活动十分满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 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王子衡

事变以后，辽宁出现了“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的汉奸政权，我当时任这个伪组织的秘书，后来又在伪满洲国历任国务

院秘书、黑河省省长、滨江省省长等伪职。下面所写的，都是我在“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一个汉奸集团成员所亲身参与以及亲见亲闻的一些事实。文中关于于冲汉、袁金铠的言论和行动，除了大部分是我所亲自耳闻目睹的以外，还有些是于冲汉之子于静远和他的管事陶某对我讲的。关于臧式毅的材料，主要是1948年我与他同被拘禁在苏联收容所时，他对我亲口所说的事实。

日军侵占沈阳和臧式毅被扣

9月19日凌晨4时，关东报社接到日本通信社沈阳电报说，中国人在满铁柳条沟附近把铁路炸毁一大段，不能通车，日本军民愤怒异常（事后才知道是日方自己毁坏铁路，诬为中国人所为，以作为侵略的借口）。日军已于10时半从日本车站开始向北大营炮击，在坦克车掩护下大举进攻，下午2时已包围北大营，中国军伤亡约有四五百人，支持不住，旅长王以哲率领败兵向东方逃走。

又据电讯称：9月19日晨6时，日军已完全占领北大营，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包围沈阳城。20日电讯：沈阳大小西关、大小南关、大小北关，都已完全被日军占领。现在日军飞机正在上空侦察，坦克车正在掩护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兵工厂、飞行场已被占领，缴获飞机三百多架，航空军司令官张焕相（后为伪满司法部大臣）以下官员都已逃避。

又据电讯：20日下午5时，在东关的中国军反击，日军迎击，中国军死伤五六人，日军无损伤，城里大街小巷已由日军担任岗哨，日本宪兵队正在三谷清队长指挥下沿户搜查中国逃兵（实际上日军借口检查，抢掠财物，污辱妇女）。

仅仅3天，在所谓不抵抗政策之下，中国军大炮500余门、

追击炮500余门、机关枪2500余支、步枪10万余支、飞机300余架，弹药、器械、被服、粮秣不计其数，都是原封不动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至于银行所存的金银宝物以及居民财物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高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到臧式毅家，对臧说：“本庄司令官本想亲身来见阁下，因为有事不得抽身，派我来见阁下传达意旨。本庄司令官对于阁下的为人是很钦佩的（本庄于1926年前曾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臧式毅很熟，并且臧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和本庄又是前后同学），我们对于阁下也是很景仰的。这次不幸演出这样事变，实在遗憾。但是责任应在贵方，我们日军迫于不得已，才出此自卫的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中日共存共荣，尤其满蒙地方，必须中日双方携手合作，才能达到开发产业、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才能共同负起保卫满蒙安全的责任，不使满蒙陷入白种人之手和避免赤化（指苏联）的祸患。我们现在很希望张学良将军翻然觉悟，早日归来，共商大事。但是这个愿望恐怕暂时不能实现，所以想请阁下仍以辽宁省主席的身份和我们合作，发出布告，保境安民，负责处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至于阁下的生命财产和地位，本庄司令官负责保证绝对安全，请勿顾虑。”

臧式毅说：“让我向贵军合作，颁布布告，保境安民，这是否等于让我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独立自主的意思？”板垣说：“是的，这样作对于中日关系、满蒙地方的人民和阁下的将来都是有好处的，请阁下不要犹豫。”臧式毅说：“我身为辽宁省主席，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张副司令的指示以前，对于本庄司令官的意见碍难接受，请原谅。”板垣说：“既这样，我就回去报告本庄司令官，但还请阁下仔细考虑考虑。”

日方诱惑臧式毅，是想利用他现有的地位，为日军维持地方秩序，比日军自己去作容易发生功效。本庄看到臧式毅一时不易说服，就于22日夜间接上尉参谋今田某（忘其名）带领卫兵2人到臧式毅家〔鲍宅〕，声称本庄司令官有事相商，请他到司令官公馆（沈阳旅馆）去。臧式毅虽然觉察事情有些不妙，但迫于威胁，不敢不同今田乘汽车离开住宅。汽车并没把臧式毅送到本庄的住处，却把他送到商埠地汤玉麟住宅监禁起来了。他被监禁以后，饮食供应倒很丰盛，连他抽大烟的烟具和鸦片烟都拿来了。臧式毅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饱吸鸦片，解愁消闷。衣服等物由他的秘书曹承宗送去，但不能见面。他对于外面的情况，当然也无从知晓了。

赵欣伯在土肥原支持下出任伪沈阳市长

9月23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沈阳市长，发出布告，恢复市政，组织伪奉天市警察局，委派尹永楨为局长，查封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三仓粮栈（张学良的私人商号）和其他私人的财产，逮捕一些无辜的居民。但是土肥原感觉他到底是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作替身。

在这里有必要把赵欣伯的历史略提一下。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脚，颇为某阔老（忘其姓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到大连。赵改名为刘笑痴（实际上赵欣伯也不是他的本姓名），他拐

来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不知其原姓名)。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很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话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作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因为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1915年到日本留学。赵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的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又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使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执刀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以博士学

位的价值，但是日本学者们多念及王爱痴的不幸而死，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使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日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作些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以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以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会对于日本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1926年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数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和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和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1000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

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组织伪政权，并叫他作替身，窃充沈阳市长。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60余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10月28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对大家胡说乱讲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带领伪警察50余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是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等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怒，便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请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进屋去，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面去，一场小小喜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忘其名）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第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20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俟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寇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仅就这一点，即可见赵欣伯当时凶恶到如何程度了。

老牌汉奸于冲汉勾结袁金铠

策划组织伪政权

9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同本庄司令官和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先是9月初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曾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1926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呆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他，他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作主。请你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军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少佐参谋和知鹰次、上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名声不好，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

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作帮手（袁曾作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缺，很赚几个钱，在辽阳占买好地1000余垧），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子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

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侵占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有根本也不想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他被朱光沐、张振鹭、鲁穆廷等等这一帮轻佻纨绔小子们包围住，这能作出什么好事来？”

“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象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应允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

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铠原是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薰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一番怂恿，早已心旌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作，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

于冲汉大笑说：“你这老奸巨滑，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

袁金铠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个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铠沉思了半天说：“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你又装胡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作什么，难道独立自主不是蒋、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的固

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是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二字比较妥当。并且阚朝玺（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奉军军长）这个家伙已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正治、水上某，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溥沂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阚朝玺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

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阚朝玺，再拉上赵欣伯，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4个人也就够了。”

袁金铠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军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玺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欣伯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袁金铠还是半推半就地说：“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袁金铠组织伪维持会

10月2日，袁金铠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鹭、建设厅长鲁穆庭、警务处长黄显声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毓黻和沈阳县长某（忘其姓名）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

袁金铠说：“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拟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以安民心。一俟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决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到会的人大家面面相觑，默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某很机警，首先发言说：“我看洁老（袁金铠别号洁珊）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洁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办就怎办吧。”于是沈阳县长某又提议推举袁金铠为委员长，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欣伯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铠提议张某（忘其姓名）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也无意见。辽宁省伪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10月3日，袁金铠即以伪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伪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

伪政权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立派满铁公司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章次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升巴仓吉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旨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阮振铎（当时吉长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铠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到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

说乱道一阵，便大摆筵宴，每饭成席。金井、升巴、阮等除了作福作威、大吃大喝外，也无所施其伎俩。

日军发动事变后三个方案

日军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40余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9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进攻，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军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凌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招集胡匪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单庭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军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号召，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声部所消灭，凌印清被枪决。

但是日军心殊不甘，声称为凌印清报仇，又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素与张学良不睦，具有野心）。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友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辽西的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作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要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薰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作犬马。本庄繁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

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20天的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

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原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作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伪组织的出现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11月1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课长中西敏宪、日本

律师中野琥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资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课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铎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明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仁等20余名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200余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本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作出对策。因此派出大批日军和汉奸，穿着中国棉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本人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12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1932年1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军侵占。辽西8个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本人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于冲汉臧式毅的勾心斗角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很没有保障，因而叛国投敌，服从日军的驱使。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命今田上尉参谋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

“委屈了你，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臧说：“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恐难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

1932年1月13日，臧式毅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殊不快。走进屋内，他看到日本人金井章次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铠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式毅由差役领到大客厅，益发感觉到“衙门依旧，景物全非”。袁金铠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他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主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象个什么主席？”袁说：“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他又说：“即使能够这样作，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威权。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象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它指挥。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或许今后他们能通知奉九（臧式毅别号），也未可知。”臧式毅被袁金铠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云章（于冲汉别号）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作个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夺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

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

臧式毅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真是可恼，混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伪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次说：“这样作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式毅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于冲汉见臧面说：“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了。”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式毅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臧式毅又被于冲汉奚落一顿，只好说：“哪里话，哪里话。”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指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并立，有些不好办，你看怎样？”于说：“你说的一点不错，一国三公，这教人民听谁的好呢？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实际上袁金铠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交椅，岂肯轻轻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作他的政治资本。臧式毅本想尽点犬马之劳，报答他主子不斩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作去，真是内外交攻，很不得劲。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方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